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

十讲

陈思和 / 著

名家专题精讲

/ 战争文化心理

/ 潜在写作

/ 民间文化形态与民间隐性结构

/ 共名与无名

/ 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

十讲

陈思和 / 著

/ 战争文化心理

/ 潜在写作

/ 民间文化形态与民间隐性结构

/ 共名与无名

/ 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

名家专题精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陈思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0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373-6

I. 中…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196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46 千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一套丛书,根据出版社的编辑要求,我应该从自己有关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中选出较有代表性的十篇论文,组成一个系列。这本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编选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是如何的随意而庞杂,连十篇像样的系列也找不出来。我在上一世纪80年代所写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也是这样,当时想好了要写十篇论文成为一个系列,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一旦突破会给文学史带来怎样的视角和理解。这个课题在当时是有些意思的,也值得去认真探讨,但我写到计划的一半的时候,因有出版社来催稿,于是匆匆结集出版,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目的。以后总是于心不甘,慢慢地作补充,每次增订或者出外文版时都作增补,直到十多年后才算凑满十章,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版本。90年代以后我就不肯再写什么系列论文或者专著,实在是觉得太累太累。我只能凭着兴致有所趣而读有所得而写,那八九种编年文集都是随意而写的产物,谈不上系统性,更谈不上“十全大补”。回顾那十几年的努力,不过是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提出了几个重新理解文学史的关键词,但似乎也没有能凑成十个。虽然眼下的研究者都在热衷于发明新概念和新名词,但我却一向轻薄于此道,我觉得提出理论见解

和关键词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一种理论见识要真正成为解释文学现象的新视角，还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实践。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我的兴趣又有所转移，更集中于当下的文学阐述与批评，也有些检验自己的文学史理论探索是否真能经得起实践的意思。如果谁要我选当代作家论的话，倒也许可以选出我的杂七杂八的十篇论文来。

但我还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来编这么一部“十讲”，我选定了五个题目，每个题目下选录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文学史关键词的阐述，一篇是相关的当代文学个案研究的文章。这五个题目也不见得有什么代表性，只是自己想借此机会看看那些理论见解与批评实践能否配起套来。这五个题目是：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以及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这些题目的相关论述来自我对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心得，但因为论题的过于宽泛和概念的缺乏界定，似乎都引起过不同意见的争议，也没有现成的、既定的结论。但是这样很好，反而能刺激许多青年学者进一步研究下去的兴趣，现在有些题目已经有研究者在做长篇论文了，我想不久就会有许多的见解被阐述出来。而在我，不过是浅尝辄止，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思路而已。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好的名声，相比之下，文学“研究”给人的感觉好一些。我知道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当代文学仍然是算不上什么学问的，因为它仅仅是凭感性而发挥的、即兴的、随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理论依据，因而是非科学性的。尤其是在商业动机加传媒操作的时代，文学批评几乎沦为吹鼓手的职业，随人做红白喜事，更加深化

了文学批评的危机。这给当代文学批评造成了很大的焦虑,近几年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类批评文章:急于搬来西方各种流行理论与批评术语,囫圇吞枣地吸收,生搬硬套地应用,企图靠新奇和刺激来提高批评的身价,结果仍然不能解释实际存在的问题。我想摆脱这种困境的丹方并不在于理论是否新奇,概念是否时髦,而在此所能提供的解释是否针对了当下的生活现状。记得还是在十多年以前《当代作家评论》刚刚创刊不久,我曾应杂志编辑的邀请写过一篇什么是批评之类的短文,我说批评与创作就好像是一条路边的两排树,看上去有点关系,但只是互相有个照应而已,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批评也是在解释世界,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做的是研究当下社会现实,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通过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联来把握问题和解释问题。西方的理论术语的引用也只能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下显示其的意义,如果离开了生活的面对,连问题都是照搬西方的,那么再好的批评也是徒劳。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需要语言的,没有新的有针对性的学术语言,很难真正进入文学领域的问题讨论。许多来自西方的理论术语自然也很好,但用来解释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总是有点隔,花费在解释术语的原意和引申义方面的精力要超过对文学现象本身的解释。所以,我有时总想对这种唯西方为是的讨论问题的模式作一点修改,以问题来带动关键词的创新。我也觉得每种理论观点要透彻详尽地去论述,大约总还需要长时间地艰苦地研究,去解释各类创作中的现象,如果能够解释得通的话,那才能算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所以我把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学术性论文与当

代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每组凑成两篇论文,以理论研究来推动文学批评,以批评实践来检验理论探索,正是我想实践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循环过程。如果这些理论主张能够开拓其他研究者的思路,举一反三地活跃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那更是超出了我对本书的希望,成为意外的收获了。

本书所收论文,最早的写于80年代末,最晚写于前几年,时间跨度很大,但思想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关于这五个关键词内含的意义也是我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逐步丰富的,到现在也还在尝试中,所以本来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我对它们的最初理解,或者说大致的定义如下:

【战争文化心理】 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潜在写作】 194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也包括许多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在聋哑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成

两种,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有诗歌小说散文等;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的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民间文化形态】“民间”一词可以拥有多种解释。《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作的定义是: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勢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之形态。这三个定义只是就民间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其中还应包括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修养等等,并以此引申出许多相关的名词概念。

【共名与无名】20世纪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民族共同利益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会达到某种统一,提出一些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时代主题。如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等等。这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常常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之为“共名”。而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这种文化状态称为“无名”。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指在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它认为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了世界格局,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其与外来文化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都是以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在这种研究视野里,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

最后还是要说明一下,这是一本类似自选集的书稿。我的论文集一向以两种形式行于市,一种是按照编年形式编的文集,按写作时间而不按体例来编书,每集所编的内容也不相重复。在九本编年体文集结束后,最近又编了一本新的文集《草心集》,年内可能会出版。还有一种是自选集类,是从已经出版的编年体文集中选出来的相对集中的论文集,现已有《陈思和自选集》、《新文学精神与当代立场》、《黑水斋漫笔》三种。本书属于后一类,所收的十篇论文,两

篇被收入《鸡鸣风雨》，一篇选自台湾版的《还原民间》，一篇选自山东友谊版的《笔走龙蛇》；其他都是近几年所写，其中四篇选自《谈虎谈兔》，另两篇新写的论文同时也收入尚未出版的《草心集》。这次在结集出版新书时，我对每一篇文章都作了一次修订，有过一些增删和修改。特此说明。

2002年8月10日于黑水斋

2002年9月8日修改毕

目 录

自序	1
1 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	1
2 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	29
3 我们的抽屉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65
4 试论无名氏的《无名书》	93
5 民间的浮沉 ——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127
6 莫言近年小说的民间叙述	167
7 试论 90 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	187
8 碎片中的世界和碎片中的历史 ——1995 年小说创作一瞥	205
9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233
10 《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273

当代文学观念中的 战争文化心理

【战争文化心理】 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到 1949 年为止,20 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战争构成的,其中对现代中国意识结构直接发生影响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另一次是 1937 年的抗日战争。前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封建帝制的崩溃和西方民主体制的尝试,它为中国现代社会开拓了一种新的文化规范:启蒙主义的文化(尽管它的真正确立是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第二次战争的结果是民族积极性的高扬,并对中国当代文化规范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全面论述抗日战争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不是本文的旨意,也非笔者能够胜任。文化是一种综合体,它的完成需要各种学科的集体努力。也许在若干年后,从事当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会以大量资料来说明,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和政策方针,经济工作以及组织生产的手段,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成就中,有多少成分是与战时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或直接源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打算只就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范围——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以及当代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作一些不成熟的探讨。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曾有两次突破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解放:第一次是五四,那是一群中国新文化的先觉者——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自我解放运动,由此建构起五四新文化;第二次是抗战,那是以中国最广大的阶级——农民为主体所投入的一场自我解放运动,由此建构起当代文化规范。这两次自我解放运动,都在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有两次突破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解放。

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联系世界现象,这两次运动的起点,也都与世界大战有关,尽管它的文化走向与西方文化的走向绝不相同。在西方,两次大战在文化上造成的走向是一致的;而在中国,由于这两次自我解放运动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之上,又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使农民与知识分子在文化结构上的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造成了两种文化价值的自身冲突。

李泽厚在论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曾注意到战争实践以及古代兵家辩证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哲学完全不同于自黑格尔以来的以“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过程系统,而是与中国的《老子》、《孙子》有着更多继承关系的“矛盾论”。^①这个论点为当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因为把毛泽东作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代言人和体现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他在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艺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曾经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后形成,正是抗战以后逐渐发生变化的文化规范的产物。换句话说,抗战形成的中国战时文化需要有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既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又了解中国国情,具备把各种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和政治学高度,使之普遍化的能力,并能够利用权力不失时机地改变文化走向的天才人物来作为它的代言人,正

^① 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74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如五四新文化选择了鲁迅、胡适等人作为它的主要代言人一样。无论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和个人威信,还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系统建树,基本上都是在延安窑洞里最后完成的。他对当代文化的一个贡献,就是以正统继承者的身份,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高度热烈的评价。据他的解释,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这就是说,抗战以后出现的新的文化规范,正是前一阶段文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绝对地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和它的旗手鲁迅以后,毛泽东又对新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样式,逐一地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后形成,正是抗战以后逐渐发生变化的文化规范的产物。抗战形成的中国战时文化,需要有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既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又了解中国国情,具备把各种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和政治学高度,使之普遍化的能力,并能够利用权力不失时机地改变文化走向的天才人物来作为它的代言人。

规范。他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两条途径：一，无条件地向大众（主要是农民）学习，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二，无条件地投入战争，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因而，也就是一切都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政策路线方针服务。可以看得出，这两个要求都鲜明地烙上了战时文化的特殊印记。

这两个要求实际上都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而是战争本身向每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要在战争实践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唯有走出原来的生活圈子，“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这时候的抗战主体人民大众，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议论对象，而是耸立在面前的实体。要用文学艺术来向他们宣传，就不得不考虑效果，首先是如何为他们所了解，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去了解他们，这就涉及到由思想感情到表现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准的新文化传统的地位，由是发生了动摇。这并非是说在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的情操修养一定错误，也并非说工农大众的审美要求一定正确，一切都只能在特定的战争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大雷雨》和《小放牛》、《兄妹开荒》之间，不管农民喜欢不喜欢，真正属于艺术精品的总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现在似乎被彻底颠倒过来了。这种价值尺度的颠倒，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的文化现象。因此毛泽东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两条要求，也唯有在抗战这样一种大文化背景下才可能被真心实意地接受，并自觉地去履行。